

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开幕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毛主席：现在开会。请恩来同志讲一讲议事日程。

〔周总理：今天开会，是通过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召开这个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刚才出席的，还有两位没到，可能一会儿就到了。出席的人数，中央委员原有的四十位。那么，要补选十位，因为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死去十人，要补十人。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提出十位同志补入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勳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原来是后补中央委员，今天，十二中全会上补入正式中央委员。（热烈鼓掌）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员原定的定额是九十七人，现在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的还有九位后补中央委员。这是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补中央委员，一共五十九人。

第二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的，那个时候中央文革起着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务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的扩大，扩大就是用碰头会的办法。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五位同志以外，我们逐步的扩大成为碰头会的组织。参加的人，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位。

另外，在军委处理日常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六位同志。

底下，这次出席会议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在二十九个省、市，除了台湾省以外，全国山河一片红了，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了。除掉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每省、市、自治区出席两人，有五十二位。这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们地方上的权力机构，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然后，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各大军区，各大军区出席一个

人。因为有的在前边兼有别的任务重复了以外，也有没再来人的。举例：如福建韩先楚同志、皮定钧同志就是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那个大军区就没有再出人了，这样的例子还有。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内蒙古军区已经隶属北京军区了）有八个人，其他三个大军区就没有再出人了。刚才说了福建、新疆，还有成都，都有两个人出席了，就不再出人了。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请了有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云汉同志、郭玉峯同志参加。所以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是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成员。

第二，主持这次会议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执行机构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大会的日常工作。具体的分组，等到会散了以后，要宣布一下，哪些做召集人的，开个小会。

第三，第一件事，就是要为“九大”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主要的两项，一项就是“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现在准备了一个草案，要提到这次会议上，请大家讨论；第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也要提到会议上请大家讨论；第三，就是讲一讲形势，从十一中全会到十二中全会所发生的这样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常说的社会主义政治大革命，再谈谈国际形势。

第四，就是现在这次专案组审查，当然主要的是中央委员跟后补中央委员在历史上发生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这次提出的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现在通过两年来，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所收集的、揭发的各种材料，经过专案组长期调查研究，现在可以确证无疑的说，他是四十多年来也可以说从他入党以来，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这点，罪证累累，铁案如山，只要看到那些材料，没有不愤慨的、仇恨的。所以，专案审查小组要向这次会议提出个报告，并且提议要把他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热烈鼓掌）他在党内四十多年来，经常在党内搞两面派的活动，包庇叛徒，是个极反动的个人野心家。他招降纳叛，树立他那个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政治上已经揭发不少了，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继续要批判的。因为他是头号的敌人，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暗藏了一伙子人，现在已被中央和地方揭发出很多，比如大家已经知道的，邓拓、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谭震林等等。但是，各有各的代理人嘛，更多嘛，不一一枚举。我们这一次打算，把这头号的，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向这次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处理这件事情。要讨论的议程就这四个问题。

还有，今天在主席台的，是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正式常委（除去刘、邓、陶以外），还有中央文革全体同志参加。现在报告完毕（热烈鼓掌）。】

毛主席：对这个议事日程有什么意见？有新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这个会大概开一个礼拜到十天。再想一想，回去想一想，有什么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来的。所谓形势问题，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

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个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在一次什么会呀？（周总理：×××工作会议）我说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真是没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呀，候补委员呀，群众不谅解。

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就是张鼎丞。这位同志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特务、叛徒那些事，就是跟饶漱石混在一块，所谓还有工作中一些错误，主要恐怕是朱×、周恩来同志说：“是因为他跟饶漱石混在一块，太明显了”。我也不太清楚。张鼎丞，邓老（邓子恢）你是很熟悉他的。这次会，不晓得是什么道理检察院无论如何放他不过（总理：有些材料，值得审查的。举个例子，在大连开黑会的时候，他参加了，高饶联盟的起点就在大连，有徐海东、高岗、饶漱石、他，徐海东和高岗这两个居然抱头痛哭，说是中央亏待了他。一个是陕北根据地，没有陕北根据地，那么中央红军就没有落脚点了。第二，徐海东讲，没有他入陕北打胜仗，中央红军就没有法子打直罗镇那一仗，他们这样说，当时高岗已经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这个事情张鼎丞参加了的，他没有揭发高饶联盟这件事。还有饶漱石在华东局的时候跟一些日本人有通敌活动，他都知道，也没揭发。）他在新四军干什么事？（总理：他是管组织，在军部。群众一直不谅解，我们还继续审查。）

象这样的人，比如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至少现在还不行。在座的有山东的同志吗？（总理：有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同志）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总是压倒，不让他们揪回去斗。（总理：后来还是回去了，斗了几次，他现在还在济南。现在站出来，群众不能谅解。）

另外，一个好的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同志，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来一检讨，群众就很谅解他。来了没有？（张体学：来了）你还不是顺利嘛，没人揪你了嘛。他一回去就说犯了错误，人家说不要讲了，这是欢迎他。

至于王任重是不行了，这个人历史上是（总理：是内奸。）国民党的。陶铸也是这个问题，也有历史问题，不单是工作上的错误。

至于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背叛党这个问题。就是七军的同志不放他，说他在艰苦的时候不跟军队，（总理：逃跑。）逃跑，（总理：张云逸揭发过。）

还有别的人揭发过。（总理：还有叶季壮。临死的时候，写了一封信）主要的问题还是到北京以后，据我看就是搞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来。那个时候点名之前批评他独立王国，他是不服的，他说他是不擅权的。实际上他是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摇鹅毛扇子的。邓小平这个人，我想替他说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他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呀，自首呀这些问题，错误的言论也不少。这个人，现在有两个材料：一个揭发他错误的材料，一个他自己写的自传，我看可以发一发，他的意思是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能够做点工作。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什么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吧。

許世友同志，來了沒有？（許世友：來了。）關於江華，我同你不是歷來保他的嗎？但現在有一分材料，就是霍士廉揭發當時的東西，恐怕不能保了，這個人哪。（許世友：不能保就不保嘛。）

有些工作是我們沒做好。我舉一個例，比如講徐州問題，你兩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怪兩個軍區我看也不行（一個南京一個濟南）。主要還是怪我們自己中央，就是沒有做好工作。現在搞起個學習班，最近兩個月抓了一下，就跟他們談，一連談了幾次呀？（黃永勝：四次。）談了四次就開始好轉了。在軍隊里分派，不僅是野戰軍跟地方軍是兩派，野戰軍，現在一派囉，都支持“支派”、“淮海八·三一”，里头有一派人是不贊成的，比較少數，多數是支持“八·三一”的。開頭是支持“支派”，反對“踢派”，後頭支持“踢派”，反對“支派”，搞了這麼個反復，以至於幾千人在南京，不得回來，有幾千人在濟南也不得回來，幾千人在連雲港，還有在徐州躲在軍隊里头。所以這個問題要引到我們自己身上，（王效禹：我們有錯誤。我們要作檢討）你們也有點分，我看主要還是怪我，是我這個人工作不好，沒抓緊做。也有些理由可講就是了，就是沒有抓緊去解決。

我們軍隊的同志是可以講清楚的，兩派也好，三派也好，是可以講清楚的。比如廣西吧，那麼亂嘛，還不是軍隊里头有兩派，一個野戰軍一派，一個地方部隊一派，就是韋國清、歐志富。你們來了嗎？（總理：來了，韋國清同志、歐志富同志。）多久不見，（韋國清：轉了，轉了，現在好了。）好了嗎？那個時候你不是吓得不敢見人嗎？（笑）那個什麼“四·二二”，也是軍隊里头有兩派，在那里搞，軍隊，這個野戰軍也是兩派的，也不只是一派，後頭統統到北京。什麼“四·二二”也好，什麼“聯指”也好，那些群眾都好講，容易解決，只要把軍隊問題解決了，群眾問題很好解決，而軍隊問題就是我們的工作問題。當時不是主張調幾個團呀？增加兵力嗎？後頭我們改變主張，不要這個，出布告，就是“七·三”布告，就是為管廣西的。這個方法也是在这里發明的，以前我們也沒有這麼搞過。開頭有個什麼“八條”，後頭有個什麼“十條”，也沒有怎麼大張旗鼓的在群眾里做宣傳，你不做宣傳，群眾就不懂得，你怪誰呀？我們幹部里头，軍隊自己，在屋子裡打架，意見不一，我們也不開訓練班。訓練班這個問題，也是學的，從內蒙古開始，在北京附近辦個訓練班，那麼對立，訓練班一辦，一個月解決問題。同志們一定有很多經驗，可以談一談這些經驗。

究竟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還是成績太少了，錯誤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也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比如廣西嘛，軍隊兩派嘛，開了會，開了學習班，就在七月二十五解決了問題。浙江問題現在沒有解決得好，我看也是個工作問題。（許世友：浙江的問題，主要是軍隊問題，軍隊自己沒有團結。）軍隊兩派，怪誰呢？單怪浙江我看也不行，也不能怪南京軍區，我看還是要怪到我們自己頭上來。（許世友：我們有責任，我們做的工作做得太少，我們已經搞過幾次了，他們不聽。）（王效禹：徐州問題，主要是我們沒有聽主席的話。）你叫王效禹同志。中央過去辦一些事情不一定樣樣都對。你開頭就搞過“支派”嘛，我們就贊成了嘛。“支派”反對“踢派”，“踢派”就紛紛跑，北跑濟南，南跑南京、上海、蚌埠。後來“踢派”回來，“踢派”的一黨政權，他

們說不是一黨政權，實際上是一個黨，“踢派”一個黨，他那個黨叫“踢派”。一個“支派”，一個“踢派”，都是有共產黨，軍隊里头也是兩方面都是共產黨，共產黨跟共產黨打架，是可以做工作的，應該做工作，是可以解決的。比如韓先楚同志，你那個問題不是很困難嗎？你們過去不是說天下大亂嗎？不是不得了嗎？後來工作一做，還不是解決了嘛。我看过你們的報告，我就覺得很好，所以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怎麼不能解決呢？我講可以解釋的，就是講工作太多。

中央有各部門，國務院呀，還有軍委呀，地方有二十九個單位，連徐州、保定、溫州，這些算起就不止囉。（總理：現在重慶還沒有怎樣解決。）現在重慶問題不是大嘛（總理：不大，還要解決一下子。），四川還有一些問題就是了。四川可打得厲害哪，雙方打的時候，總是幾萬人，有無線電指揮。你說那就不得了哇？天就跌下來啦，才沒有哪回事呀。誰叫你去搞“二月逆流”不是講發了一個什麼東西去了嗎？还用飛機散發了，接著就捉人，鎮反，不多不少捉了十萬人，中國人多得很，四川人特別多，比那一省都多，所以他捉人也不少，十萬。你說那個問題不得解決嗎？捉錯了放了就完了嘛。大概都放了吧！四川的同志呀（張國華：還有五百多人，是有問題的），你十萬人，就放了九萬九千五百人。那是我們自己搞錯了嘛，你怪那一個呀？誰叫你發那個傳單。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這麼秋風掃落葉，這麼一掃，三年半差不多。這個文化大革命，比那個簡直困難得多，但是比我們過去打二十二年，還算容易。過去我們打二十二年，從1927打到1949。這回文化大革命，我們才搞了兩年半。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志有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候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這也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解決，一個省一個省來解決。有些省拖到，比如遼寧省就八個月，他也是天下大亂，三大派，結果還是解決了嘛。我們看還是能夠解決，自己多担點責任，使得下面輕一點，主要的我看是思想問題，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間隱藏了一些敵我關係，那是少數。主要的是我們工作做得好，問題就好解決。

浙江省“紅暴”派來了二十一個人說他們參加的人太少了。接著就是另外一派，叫“省聯總”，要把這二十一個人捉回去，帶了繩子，要捆起他們回去，後來經過我們做工作，這工作是清華大學的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傳隊做的，這麼一做，做得兩派都高興得很，捆也不捆了，一定要參加北京會的也不參加了，看了放焰火，雙方做了自我批評回去了。浙江兩派的問題還是做工作的問題，基本上不是一個什麼別的問題，因為中央過去跟他們也是搞了幾回的。開始支持那個“紅暴”這邊的——省軍區，以後搞不下去了，又支持“省聯總”，支持二十軍同空五軍。現在還沒有解決。

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你們先談，我說還是把“九大”的問題先談一談，然後都來談一談經驗，國內問題。

還有一個“多中心論”的問題。這是從楊成武在總參謀部開始的。就是他那個地方搞了一個“大樹特樹”，其實就是樹他。然後我看見了，北京好幾個學校，一個學校分成兩派，各有武裝在打，誰的話都不聽，你一個學校，總是應該是一個中心，他不，搞兩個中心，搞兩個中心不多了一個嗎？叫“多中心”。一個工廠，也搞兩派，如果有武裝，兩個武裝打，不是兩個中心嗎？一個工廠只能搞一個，現在不是所有工廠都團結起來搞一個革命委員會嗎？北京的例子就很少。我是歷來主張上海比北京強的，上海他有一百

二十万产业工人掌握局势，北京有八十万工人，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吗？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就在北京，我们身边。现在的办法就是：那个地方知识分子最多，把工人宣传队开进去，名为掺沙子，就是说你那个土太紧了，叫粘粘土，因此不长粮食，他不透气。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大好办，有些同志在那个知识分子里头搞久了也就不好。我们跟老总经常谈过，现在还是那派的人抓住他不放就是了，不过不叫打倒，叫炮轰，炮打磊荣臻，这是谁呀？主要是“九·一六”，科委机关也有部分人，他这个机关也是很难办的，一个七机部，一个科委所属，听说有十几万人，其中有七万大学生，我说这个事情就不容易办了。所以有人提出要炮轰，这还是很客气的了。又拖了两年多不得解决，现在还不是开工人宣传队、解放军进去。但是听说还有些问题，他们还在那里争，无非是花名单啦，什么东西啦，不管什么地方（有些地方来不及，工人宣传队、解放军没那么多，抽不来）所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机关中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你们也清楚。你有什么意见要讲一讲？（林副主席：主席讲得很好。）你们有讲的没有？有讲的讲一讲，谁要讲都可以。

还有一个同志。（陈伯达：主席提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实践已经做了结论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当中，出了些毛病，有些错误，但是主流是不能推翻的，我觉得主席这个结论）我没做结论。（陈伯达：不，主席这个意见，我同意主席这个意见。）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做了结论还开什么会呀？（陈伯达：刚才我说这个话就有错误了，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不做结论，讨论，我是觉得是要搞的。不搞资本主义要复辟。）你是组长啊！（陈伯达：有错误主要是我这个组长负责任，我是一个别脚的组长，大家如果对中央有意见，首先是我应当负责任。总理：我也参加了碰头会，我也一道负责。陈伯达：主席对我们的很多指示，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没有很好的去做，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个主要应当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负责任。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江青同志她是很多事情她做得比我对，比我好。江青：我不同意这个讲法，主席提出问题，我们就按照主席提出的问题讨论嘛。陈伯达：大家可以批评，有意见可以提出。当然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江青：唉，别这样了。陈伯达：我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不够好，没有很好的及时地认真地贯彻。）

我刚才讲还有一个同志是讲肖克，他也是打过仗的，立过战功才上天安门的，这次国庆也上了。为什么这次会没有来呢？他们揭发出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我也搞不大清楚。（总理：他参加南昌起义。在××失败以后，他是一个代里连长，七十一团，叶挺的二十四师，率领了有一、二十支枪的武装，被一个村子里的白军即民团包围，他一枪不放就交枪被俘，向敌人投降了。交枪以后，地方已经转到潮州，或者潮安，或者潮阳之间的一个村庄。然后据他说，由于痢疾流行，没管他们，他们就跑了，跑了以后转到韶关，那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带了一部分军队分散，大概就是投蒋了。他又转到那个军队当兵，转到湘南，又离开，回到他家乡，与几个党员，也没有组织关系，组织了一个党，以后湘南暴动他参加，主要是这段历史过去不晓得，被农垦部的革命造反派查出来了，有根有据，他自己也承认了，交待不清楚，这样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历史问题。）

还有一个陈漫远。（总理：陈漫远，原来也上过天安门，陈漫远现在已经查出来，也是农

垦部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当时在梧州一个书店里当经理，被捕了。被捕以后就要叛死刑。他就哀求，写信给当时的广西反动派的七军，他的一个认识的人或者亲戚，写信苦苦哀求要救他，等于向敌人乞降了，后来改成判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他还是觉得不够，又求，不断地哀求。到了1929年×××在南宁挂起所谓反蒋起义，就是×××的七军的主要部分发动了反蒋，我们进行工作了，梧州当然有七军的人在那个地方，他又哀求七军的人把他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就向敌人下跪，表示以后不再干共产党了的声明。通过一些辗转他又到了我们的红七军了，也是有人揭发，经过调查，实在有这些事情，他自己也很难解释这个问题。这两个人的这段历史都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因此现在不能参加我们这个庄严的会。）

如果你们今天不讲话，以后讲。

（总理：我说几句关于分组的事，我们各位同志回到住的地方以后，我们补充分组的名单，主席、林副主席不编入小组，一百三十一人，共分六个组，六个组以各省、市革命委员会为基础来分，不详细说了，就是把现在指定的组长唸一下子。因为散会以后还要请到南面河北厅，走过去就是，开过短会，中央文革碰头会同志给各位拉开。第一组：谢富治、李作鹏、潘复生三位同志。第二组召集人：温玉成、冼恒汉、杨得志。第三组召集人：吴法宪、曾思王、王洪文、李雪峯四位同志。）王洪文是上海的工人同志。（总理：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第四组召集人：汪东兴、许世友、程世清三位同志。第五组：黄永胜、韩先楚、李瑞山、刘兴元四位同志。第六组：叶群、陈锡联、李德生、刘建勳四位同志。）哪个叫李德生？（总理：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请站出来。不认识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你是啥地方的人？（李：河南×县人。）你多大年纪？（李：五十二。）军长，十二军。我们不是通报他那个整蕪湖，整蕪湖整得不错呀，那个蕪湖这两年来可复杂啦。（李：主席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许世友同志你讲什么？（许：解决蕪湖案件，主要是造舆论造得好。）就是要造舆论，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搞了这么几十年了，还不晓得造舆论（众笑）？好象是一大发明。其实我们这几十年，我们就是造舆论，不然怎么能够搞起红军、解放军、新四军、八路军，搞那么多队伍。没有群众，那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就没有军队，没有党。你不宣传，谁信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地方都有什么“支派”、“踢派”，什么“人民公社”，什么“反到底”呀，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在重庆啦。在北京清华大学有什么“井冈山”，“四·一四”，七机部有什么“九·一五”、“九·一六”。到处都有，我看也怪，这件事我们开始都没想到。南京有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谁知道后来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还有一个“促联”。所以解放军支左必须要支，解放军我看这两年也得到了锻炼，无非是犯一次错误，犯错误改一改，群众还是谅解的嘛。

十一中全会上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结果他就要武斗不要文斗。（笑）一个工厂两派斗，各有武装，一个学校两派斗，两个政府，两个中心，甚至一个部，比如七机部，那就多哩。

基本群众是工人农民，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兵。然后是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应该争取团结，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什么？最容易动摇。为什么容易动摇？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农民结合，他们应该

晓得他們的弱点。但是不能一講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我說稍微臭一下那也可以，（笑）但是那么十分臭就不太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不可不要，但是不可讓他的尾巴翘到天上去，知识分子如果翘尾巴就不得了。这个大学我們主张至少这两年不办，不招学生，讓他統統毕业，叫他同工农兵去混，我看天也跌不下来。以后重新再搞，搞那个从工厂里头、从参加农村工作的中学生来学习，这包括軍事学校。誰知道一下子就办了111个軍事学校。总而言之“妖、妖、妖”，其中确实有妖就是了。（笑）当然还是怪我們自己，过去办那么多干什么？我們整么沒管呀？你說沒管也管过，叶剑英你不是专管这一項的嗎？不是搞什么四清嗎？那个不解決問題，所以这回軍事学校索性統統开工人进去，开军队进去，無論你是陆軍也好，空軍也好。解放軍也好，除了一些教导队性質的学校不需要外。

这场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現在不是講要进行到底嗎？什么叫到底？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厂你确实看一看，不整也是不得了。比如北京有个木材工厂，一千多人，它是二百家小資本家，小木材工厂二百家合起来的，資本家之多，这个厂就有二百家資本家，小厂啦。有些厂所謂三朝元老，有四朝元老，比如新华印刷厂，他就是四朝元老，第一，給白洋軍閥印鈔票。第二，日本人来了，給日本人印传单、报纸。第三，国民党接管，又跟国民党。第四，共产党又接管，它都吃得开。叫做三开或四开干部，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好的，是敌人有计划所謂应变計劃隐藏起来的。我們派去的一些人，也不得力，思想状况，精神状况也不好。你不清一清，不整一整哪，这个工厂究竟是雕的，很成問題。

好象大体上說来，农村还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問題。农村在今年的冬季和明年春季，春耕以前，还没有搞好的那些生产大队、公社应该好好抓一下，这还是靠人民解放軍和革委会（省、地区和县革命委员会）。靠宣传，有一个省組織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軍只有少数，大概有一万多两万，九十几万都是貧下中农。我講的是广东。

江西也是好的。就是依靠解放軍和貧下中农。江西是一个中等人口的省，有两千三百万人口。

有些地方人太多。省一級机构，有一个省省一級有七千人，这么多人，現在至少要減掉六千多人。你減到那里去？那还不是在中国境内，中国境内地方很多，一个是在城市，一个是在农村，还是到农村为主，因为工厂一下子不可能增加很多人。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不好？你們还开什么会？（总理：召集人。会。六个小組，二十三位同志，加文革的有参加的，另外还有六位同志，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二位同志。还有一件事通知一下，开会的时间預定是每天的下午三点半到六点半，在这里吃飯，然后八点到十一点，总共六小时，下午和晚上。）那样不行了，开了下午，就不要开晚上了。（总理：只开一次。六点半也可能延长半个鐘头。第二件事，就是有几位同志請軍委办事組邱作会同志招呼一下子，接到京西，宾馆住。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可能沒到吧？陈少敏：到了。总理：胡耀帮同志，李志民同志，张宗逊同志，宋时伦同志，范文澜同志，六位同志，不要回家了，邱作会同志派由人領你們住京西宾馆，回家拿什么衣裳，另外再派人替你們去拿，再唸一遍。……）

散会了。（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党的八届扩大的 十二中全会閉幕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热烈鼓掌）

毛主席：我們的会今天是最后一天，請恩来同志講話。

〔总理：同志們，第一个文件是公报，今天上午六个小时一致通过了，准备明天晚上发表，就不需要再征求同意了吧。这是公开的。还有不公开的，内部文件，有三个。一个是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三个附件，各組都討論过了，也是一致同意的。三个附件第一个是代表的比例、成分。第二是除去军队的代表同志以外，一千另十名分配在各省，每省多少也在各組討論过了。第三个附件就是军队的分配，一部分是军队本身的，一部分是与三結合的，三結合的是一百二十多人，这也分配好了，这个文件是要紧接着回去办的，这个文件是不是現在在这里通过一下子，同意嗎？（热烈鼓掌通过）内部的第二个文件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这个在昨天晚上最后一次討論时大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說还要把章程草案压縮一点，短一点，有些組作了这些工作，有些組还没有作，所以今天提出来，这个决定是要通过的，这个党章草案本身基本通过，然后由中央文革再把文字压縮一下子，原則大家都是通过的，这样更容易在工农兵群众中宣传討論。在大概几天之后了压縮，經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閱讀和批准以后，就发給地方，这是要广泛地发的，将来由中央自己印发版本发給各地方。有没有不同意見的？（热烈鼓掌通过）通过了。内部的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組关于叛徒、內奸、工賊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証（附件），这个各小組已經討論了几天了，一致声討完全同意主席提出来把“提交法庭依法惩办”这句去掉，加了报告上没有的“繼續追查刘賊及其一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还有什么意見？（热烈鼓掌通过），通过。准备在文字上有点增加，关于罪行还准备印得使广大党内外群众能看懂，有些字不清楚的地方用鉛字附印在后面，編輯一下子，大概也要几天后，由中央印出版本来发各地，通过省市革委会系統，通过军队系統发下去。这就是内部三个文件，加公报，共四个文件。

还有这么个事，就是如何传达这一次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會議的情形。打算由中央、中央文革发一个通知，今天会散了以后，由中央文革在文字斟酌以后，通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以后再发，主要内容說明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参加者、負責同志、各大軍区参加的負責同志回去传达基本上是根据我們这次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当然每段都要作解釋的，由各个参加会议的同志来負責传达，加以解釋。材料，我們所发的简报和有些文件，每一个省带一分回去（全分），由指定省軍区的一位同志負責保管

在省軍區的保密室。凡參加全會的那個省的同志可以去看，因為他要傳達，有些材料要看一看。大軍區的同樣帶一分回去，保留在大軍區的保密室裡，由參加會議負責同志，去查看就是了。中央在中央辦公廳和軍委辦事組各存一分，在中央參加會議的，如果要傳達，需要查閱的可以到中央辦公廳和軍委辦事組。傳達就根據全會的公報上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傳達。為了要使各地方知道這個事情，要發一個通知說明，然後把剛才說的三個內部文件如何處理情況說清楚。首先要處理的是關於九大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和三個附件上所規定的那些辦法，首先要解決。因為，要反復商量。首先回去要成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員為“九大”協商代表的工作小組，要報到中央來經過批准以後就進行協商，提名單，往返協商。名單限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就要交到中央，這件事比較急，跟傳達相同的，首先要作的。至於關於黨章草案，等到中央壓縮了以後發下去的版本，普遍發到黨內外的廣大群眾，凡是革委會已經成立了，已經經過了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在那個地方就討論，吸收到各級革命委員會討論，廣泛討論，徵求意見。關於劉賊的罪行的公布，公報上已經作了決定，具體內容，有了審查報告和罪証的附件，然後廣泛的解釋，有的發到手里很多了，這個在通知上說清楚。還有，這個會今天閉幕以後，希望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來的同志、各大軍區來的同志，能早回去，因為公報一發表就要傳達，各地方就要問，這些事情，所以不宜於在北京再耽擱久了，有些工作上的問題，以後再談，因為現在急於要回去傳達和產生“九大”代表，這兩件事比較急，一般的同志明天後天就要回去了。報告完了。〕

毛主席：有什麼意見？有意見請發表，都不吭聲啊？看你們在小組會上都講完了的樣子。（熱烈鼓掌）

我沒有什麼話講了，林彪同志講了那麼多，同志們也都講了很多。這次會我看是開得還可以，開得好嘛。（毛主席批評記者講：不要照了，你們這些人就是搞干擾，不要搞那麼大的燈光）特別是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半个月，十八天比較了解了。象高級幹部都不大清楚，我們過去也沒有通風，過去各省也都有人來了，也沒有人解決問題，也沒有功夫來講這些事情。在這個全會上，由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經過幾次反復，使大家比較清楚了，每天都有簡報。這件事要說小嘛，也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我們在北京的同志看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意見，不同嘛，是要說嘛！要說就要談一談，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又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又是公開出來講的，又不是完全不公開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沒有什麼秘密嘛。不過有一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在最近簡報上看到了些情況，我看到是些細節勿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在桌面上講過些什麼小道消息。我看那些事情，倒是不需要那麼著重。如果黨內的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把人引導到注意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反倒不大注意就不那麼好了。所以我說事情是相當大的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說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或者地球就不轉了，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的，因為只有那麼六七個人，還能翻得地球不轉嗎？

我到是很佩服鄧老，一直頂住。你為什麼最後又搞出一篇來了，這是個什麼？頂住就好嘛，有那麼一個人，根本就是無理，結果他還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評。他倒是老早就有自我批評的，比如在北戴河嘛。

至於有一些老同志，將來是不是還可能工作？我所謂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經打倒了的，如譚啟龍、江渭清這些人，也許過幾年之後，大家的气消了，讓他們做點什麼不掌權的工作。比如楊勇、廖漢生這類人，人家現還在年富力強嘛。

比如鄧華。鄧華同志來了沒有？（答：來了）多久不見你了，你這位同志跑到四川去工作，歷來沒有聽到人家講說他不好的，說他在那里去搗亂呀，因此，我們請他來問，沒料到紅衛兵又把他關起來了，這是在四川嘛。（總理：在成都）就是說，包括他這樣的人，犯過一次錯誤，跟着彭德懷走，可以讓他改正錯誤就行了。

至於揪在北京的還有黃克誠、譚政。就是說犯了錯誤的人，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而要允許他改正錯誤呢，就需要一個時間，甚至於要多少年。因為群眾就是要看他的表現嘛。

最近我們各地方正在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清理階級隊伍請大家應該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講要穩、要准、要狠嗎？我看穩這個東西，可以有右的穩，一穩他就不搞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中間還是這個“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也狠不起來，也就不那麼穩了嘛。所以還是要注意調查研究，要重證據，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噴氣式。這個辦法我們歷史上沒有的。我說罪魁禍首還是我，就是因為一九二七年不是湖南農民運動高潮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面講到農民怎樣對付地主戴高帽子游鄉，所以後來紅衛兵也是從我那書上抄我那個東西，戴高帽子。但是自從那以後幾十年沒有搞了，沒什麼戴高帽子，現在加上個掛黑牌子，這是逐步升級。又搞上個什麼噴氣式，這個噴氣式有各種各樣的噴氣式。有一種噴氣式，確是使人難受。要重證據，不要重口供。要多做調查研究，不要搞打人，不要搞這些戴高帽子、噴氣式這一套。這一套搞的結果並不那么好。我們對於敵人俘虜也不搞這一套。在北京還有比如杜聿明、王耀武這些人，我看對於同志，就是對敵人，比如特務、漢奸、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那你怎麼辦？比如講北京大學的馮友蘭、你要他不搞唯心主義，那個東西很難。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還有翦伯贊，史學教授，副校長，你要他立場觀點改變，也很難。我看對於這些人，過去人家是權威，叫什麼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是我們對這類人不要搞這些不尊重他們的辦法，對扣他們的新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每個月多少，二十四塊，或者最高四十，稍微放寬點，有些老人，不然說我們文化大革命給他們身上太挖苦了。這些人用途是不多了。比如剛才講的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可能也還有某種用途，你如果要問那個唯心主義，現在還得請教他，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因為帝王將相我們不大熟悉，特別是年青人他們不熟，在座有范老，他也是搞帝王將相的。其實我這個人，也是搞帝王將相的。董老恐怕也算一個吧。你現在沒有別的書看，你如果要看，還無非是二十四史之類。我也贊成搞點帝王將相。因為你們不是要反帝王將相嗎？你不懂帝王將相，就不大好反。人家一問什麼叫帝王將相？你就答不出來。但是我並不勸在座的同志統統去搞帝王將相，就是為了答复什麼叫帝王將相起見，因此要大搞其帝王將相，我並不勸你們這麼搞啊，你們現在還是照總理講的，讀這

几个文件啦。青年学生也不要搞。有少数人比如說就象翦伯贊、馮友兰这些,包括我們的范老搞一点也可以,有少数人去搞,使帝王将相不絕种(笑)。不是講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說帝王将相这个历史有人注意。对这些人,請你們注意。

在清理階級队伍中,对学者,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較好的、中間派、极右的这么三种。我現在着重講的就是这个比較右的,我們怎样对待他們。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沒有右,你这个左从哪里来的呀?为什么人长两只手,这个叫右手,这个叫左手,长一只不行嗎?他就要长两只呀。

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贊成,有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我們这个党經過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比較纯一些,从来沒有这么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够好。比如講“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我們还是推荐各地方把他們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右的那方面的資格(笑),以这个身分参加“九大”,对我們那个三条中第二条是不那么合,作为协商,有这么少数人参加,我看有好处。

現在的情况同二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見得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

今天就講这么一点。

稳、准、狠的問題,注意調查研究。主要是注意調查研究,注意“准”字,会有一些不那么准的,有狠过了头的,也会有一些狠不起来的,也不那么准和狠,太稳了。这种不平衡的状态,無論那个地方都存在。比如上海,据上海的同志講,他們那里还存在一些所謂“老大难”問題,还不少,有那么平衡呀?几百万人的一个市。又比如北京,就不平衡。不平衡是一种自然状态。

其次,对学者,所謂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

再就是对我們一些老同志犯錯誤的,虽然对第二条标准不那么合,但是用协商方法,帮助他們当选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意見不同,我看是好事。只要基本的部分是保証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見,就好了。

还有同志講嗎?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有意見沒有?富春同志?(当时李、朱、陈表示了态。略)你在安源呆过一年呀?(李富春:不到一年。)你認識些什么人?比如朱少連認識不認識?(李:認識。)朱景堂?(李:記不起了。)黄占元呢,那个时候干什么?(李:……)你干什么?(李:我搞宣传工作,在講演股,文艺、講演搞这些东西,一般的工作。)这都是些新聞,过去不知你在安源搞过(李:我跟毛泽民同志在一起。)啊,还有毛泽民呀?(李:他是搞合作社的經理,我們是一起調出来的,我跟他一起到广东去。)那你参加譚延闓軍隊里头的政治工作那是以后的事囉?(李:是以后,是从安源出来到广东軍隊里面。)教导师嗎?(李:第六师,戴岳那个师。)那时是党代?(李:軍党代表。)

×××同志你不是在长沙搞过农民运动嗎?好像是长沙农民运动的委員长,叶德輝就是你手里杀掉的嘛,保孔夫子,反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輝,一个湖南人,旧知识分子(翰林)。过后有人問我有这事嗎?我說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我当时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把叶德輝杀掉,我看不那么妥当。你們各省

都有,特别是大城市有大知识分子叶德輝之类。总想找个机会給同志們講一講,就这一次講一講吧。就是那些人是放毒的,如吳晗、翦伯贊、馮友兰,現在我們对待他們,就是批評是了,批是要批的,也有个一批二保的道理,也得給他吃飯,現在叫他們下去受劳动人民再教育我看也不行了吧?你叫吳晗、翦伯贊这些人,还有华罗庚,你这个王震的朋友,华罗庚是科学家,数学家,我們是保他的。象这些人不要对他們太过分了。我看,用这种會議上講清楚这些問題,但是个别的講不行,报纸上写社論也不大好写,一写他們就过关了,都不要批了。不是搞大批判嗎?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保他干什么?不是保他要他当副校长,翦伯贊,馮友兰的哲学系主任也不要讓他再当了。教授的头銜还可以存在,好領薪水嘛。

又比如我知道的好几个人。广东的楊永国,我沒見過这个人,看过他的書,听說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党校的教授赵从炳,这两位都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这两位書注意看。还有北大教授尹金钰,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基本上是有點尊孔的,因为你那个書上有孔夫子的像。馮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比較有点偏向,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貴族,我偏向这方面,而不贊成說孔夫子代表那时新兴的地主階級,因此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十批判”……,在这点上我也不那么贊成。但是在范老的書上,对于法家是給了地位的,……。这是古董,我也不劝同志們回去研究这一套呀!

尹金钰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不那么贊成。天津有个教授楊××說老子是唯心論者,开始我很注意这个人,后来一調查,糟糕,这个人是右派。我跟这些右派是相当有关系的。(笑)

到現在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認識,沒見過面。

你們上海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結。刘大結著了一部文学史,周谷城写了一部世界通史,这两位好象刘大結比較好一点吧?但是你們对譚家貞是整了嗎?譚家貞他是摩尔根遗传学的,这些人改了也行,不改也可以。这些人,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中国也只有这么几个。还有苏步青,复旦副校长,数学家。也不要那么太过分了。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

清理階級队伍,注意調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

对党內的一些老同志,一批二保还要三看。所謂保就是帮助他們,看就是看他們以后情况,改不改,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不那么贊成。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我刚才講了,地球照样轉,这个胡琴不要拉得太紧了。

对于这些学术权威很要注意。交給那些学生七斗、八斗,許多人他就不要命了。薪水減得只有二十四元,四十元呀,他一家子人,我看还是少了一点。我看,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来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以后要不要民主党派,这个問題这次来不及討論,曾經我們的意見还是要,与其不要,不如要好一些。因为問題决定不在这些民主党派,而是共产党里面的問題。民主党派如果有問題也是第二位的問題。共产党里不出刘、邓、陶之类,不出这些問題,民主党派要造反我看造不起来。与其讓他們秘密的搞,不如讓他們公开。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我們过去这样想。因为这次来不及討論,以后还要不要政协,要不要民主党派,

我看以后再討論，下一次中央全会，或者“九大”以后的中央全会。过去我們派进去做工作的人，也不得力，这个统战部的人，徐冰就不那么好。……

所謂有少数人可以搞点帝王将相。为了反对帝王将相来搞点帝王将相，就是說在少数大学里头，科学院里头，所謂使帝王将相不絕种，就是指他們囉。

至于大学里开社会科学課，这个问题現在还没有解决，究竟怎么好？大学里讀历史，讀经济学，讀哲学，讀什么法律，总而言之到现在这十八、九年是没有好的结果的，讀四、五年大学，讀这些社会科学的人，他就不懂得什么叫馬列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还不如不讀，去参加工业农业，混过几年之后再讀那么一两年。

现在的大学已經两年了，我看再准备一个什么两、三年，就差不多走光了。已經两年了，再搞三年，不就五年了吗？那第一年来不是搞了五年了，你还不走？所以我相当贊成这个斗、批、走（笑）。你总要走嘛，你要斗、要批，批了之后，我看没有多少学場了。現在这批大学生就讓他們下去了。到工厂里去学，到农村里去学，这是帮助他們的一个方法。在大学里無論你派多少工人宣传队，你总沒有做工呀！你总沒有种地呀！这个问题也沒有最后决定，可能我們是要犯一个大錯誤就是了。二年了，你还要准备两、三年根本不招生。大学不招生，讓他們斗，批之后，走向社会，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今天是出題目啊。这个问题以及民主党派的问题，請大家考虑一下。

还有哪个講話？你們几位，又是北京，又是上海，两头跑的，有什么意見呀？你們上海同志有什么意見？（王洪文：坚决拥护全会的决定。）

（毛主席看見王洪文同志）你站起来給人家看看，人家都不認識你。此人叫王洪文。你三十几呀？（王：三十四岁。）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負責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員，主要成員之一。他就是一月革命之前，前年十一月搞安亭事件。我們这次会，有这么年青的同志参加是好事，可是太少。

（总理：还有尉风英。）尉风英，你多大？（尉：三十四岁。）你也三十四，我們这里三十几就算是很年輕的了。

哪一位是刘殿臣？看样子你是个軍人。你在哪里工作？（刘：在石家庄国棉一厂。）（总理：你三十几？）（刘：三十二岁。）

还有年青的同志沒有？你們三位就代表啦？（总理：还有青海的达洛同志，三十八岁，藏族。）你能够講我們这个話嗎？（达洛：会講一点。）（林副主席：你是西藏人嗎？）（达洛：青海人。）青海藏族。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真藏族。）（林副主席：你能講藏族話嗎？）（达洛：会，工作以后学的汉說。）

賽福鼎同志，你汉语講得好不好？（賽：还没学好。）（总理：非講不可，沒翻譯。）逼得你非講不可。不是講你們新疆要团结起来，那一次我給你講。現在你們那里可能还有些問題。（賽：还有問題。）来了几个人？有龙書金嗎？（龙立即站了起来）他还是我的老乡囉。你是什么地方人？（龙：茶陵人。）还有王恩茂，你有些做法很笨。不应该那沒笨了，（王：犯了很大錯誤）搞那么一些人来拥护你，到飞机场来欢迎呀，搞那些事情干啥啦。結果就一派拥护你，一派反对。（王：要坚决听主席話，改正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的錯誤。）总有人給你出主意，有人搖鹅毛扇子。

陈永貴同志。（陈永貴立即起立）你那个打扮还是你的本色。大寨也是有灾难，每天有一万人參觀，怎么得了？不把粮食搞乱了嗎？（陈：不要紧，對我們鼓励促进很大，没有什么大的麻煩。今年有点灾收成还很好，比去年少一点。）

冼恒汉同志，我都不認識冼恒汉同志呀。（总理：您把眼鏡拿来就看清了。）你是哈地方人？广西佬啊！你認識韦国清嗎？（冼：原来不認識，解放后認識的。）你过去在哪个部队？（冼：七軍。）在七軍为什么不認識韦国清？（冼：那个时候当兵。）韦国清也是当兵嘛，韦国清，你們两个老死不相往来。一个广西，一个甘肃。

还有张达志来了沒有？你这个同志不是翻了一下嗎？好了沒有？（张：好了。）好。你多大呀？（张：五十七岁。）冼恒汉同志多大？（冼：五十六。）你們差太多。韦国清呢？（韦：五十七岁。）你們都是同輩兄弟囉。你們这三个广西佬。

在座的我还有一些人不認識。（周总理給毛主席介紹青海的张江霖同志）你就是张江霖。久聞大名，未見其人。見過几次不曉得你的名字。你是哪里人？（张：四川人。）四川哪个地方？（张：达县。）达县，就跟伯承同志是同乡。（总理：伯承同志是开县。）过去在軍隊干什么？（张：当兵，以后当排长，连长，团长，參謀，作战部长。）打过仗沒有？（张：抗日、解放战争打过仗。）看样子，你有多大？（张：五十二岁。）沒有那么大，你虛报年龄（众笑）（张：參軍參得早。）看样子才三十几。（张：33年參軍，不到十八岁。）33年在四川參什么軍呀？（张：四方面軍，过草地地方过一点。）所以不要以为四方面軍出了张国焘就沒有好人了，我們在座的就有多少是四方面軍的同志嘛。（总理：不少。）我就不相信，过去苏区出了王明就沒有好人嗎？陕北出了高崗就沒有好人嗎？沒有那么回事嘛！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陈独秀你們在座認識的就不很多。（毛主席問总理）你認識他嗎？（总理：認識。康老也認識。）将来写党史，陈独秀沒有名字，恐怕也不好。苏联联共布党史有布哈林，开始是他，我們講他不好，是講他后期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思想。

不因为我們这个党出了什么陈独秀、瞿秋白，又是什么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崗、饒漱石这些人，說我們这个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啦。我看不能这样說。

坏人是有，开头他不是当做坏人出現的。想到井崗山那些人，开始有余少甫，苏先正，两个师长，后头編了一个团，就是陈浩，后面又有龔楚，也是一个团长，还有范树德、楊育冰、全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革命的，那我們的井崗山矮了一节嗎？我看沒有！我去过，不久，今年三月，山还是那样。

这次又清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鑄、彭、罗、陆、楊、賀龙、彭德怀，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点有保留。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只要我們举手那还不开除他。你們将来要开除也是可以的，那一天开除都行。至于怕他造反，我看倒是不要怕，他也是造不起反来。这个人的特点是脱离群众。我这个人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給邓小平講几句好話。不过，講他是搖鹅毛扇子的，他是那个司令部搖鹅毛扇子的人。真正决策还是是他。到北京以来，有些事情，如招降納叛，他是有分的。“八大”前后，“七大”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們搞的，……在延安还开了一个白区工作會議。

过去我是給一些同志講过，对賀龙可能是一批二保，当时他的面目不大清楚，因为

他是二方面軍的旗幟。現在看起來，賀龍這個人不能保，於是這個意見就放棄了。因為他搞的那些事，那時我們還不清楚，那時揭發賀龍那些事時，我們不是說賀龍還是要保嗎？後來從成鈞、劉震、許光達、廖漢生等跟賀龍走的人揭發他的事實，他是破壞我們的軍隊的，他背地里搞一些事情，說他要篡軍、反黨有他的企圖我看是有的，要實行，就是沒有來得及。賀龍、羅瑞卿、劉震、王尚榮、許光達這些人。

不要扯遠了，行不行，就到這裡為止。散會。

（熱烈鼓掌）

（久久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